

井冈山时期党创办的红四军军官教导队

□ 邱 明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向中共中央汇报：“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这个教导队就是成立于1928年8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以下简称红四军军官教导队），其校舍坐落于井冈山茨坪镇东山脚下的店上村，与红四军军械处相连。红四军军官教导队是由毛泽东、朱德亲自创办的我党我军早期的军校，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重要阵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官兵的军事素养薄弱，许多人没有经过基本的军事训练。为了提高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1927年11月，毛泽东在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1928年5月初，朱毛会师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成立。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教导大队随之改称红四军教导大队。8月，红四军教导大队改称红四军军官教导队，并在茨坪正式开学。全队学员增至150余人，编成3个区队。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排长、班长或优秀战士，还有一些是地方县、区、乡农会和赤卫队干部。教导队由梁军任队长，蔡会文任党代表，周子昆任副队长。宋裕和、谭冠三、王紫峰等都是第一期学员。

教导队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和文化3个方面。其中军事占60%，政治占30%，文化占10%。军事课有基本知识、战术与基础技术。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文化课是开展识字活动，规定每个学员每天识5至6个生字，每天熟记一条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课余时间开展娱乐活动，做游戏、下棋或唱歌。当时教唱的革命歌曲有《国际歌》《红军跑步歌》等。

早操内容为跑步，时间两小时。茨坪四面是长满青松翠竹的高山，每次跑步要爬几个山头，这种体能训练强度很大。每天上午用4个小时上课或操练，下午用2个小时分班组开会讨论。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抽调了有经验的干部充任专职教官，并规定部队负责人轮流教课。教官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训练



红四军军官教导队校舍旧址

中每个动作都必须合乎标准，稍差一点，便重复再做。教员们的讲课既耐心细致又善于启发，通过讲述通俗易懂的道理教育学员克服地方主义、农民意识、“流寇”思想等问题，提高思想觉悟。

由于人多枪少，子弹奇缺，射击训练只能轮流进行，击发动作采取“开弓不放箭”的办法。没有黑板、课桌，学员就自己动手锯木料做黑板，用竹子做桌椅板凳，还发明了用竹片蘸墨水写字的办法。粮食和经费不足，教导队每天只吃两顿饭。主食是糙米、南瓜，有时挖野菜和竹笋。冬天没有棉衣棉被，就把稻草塞进夹被里御寒，大家戏称为“金丝被”。学员们一面学习，一面打柴、挑粮，尽可能地帮助群众生产。教导队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禁止打骂等行为；在经济上由士兵委员会组织学员轮流监厨、买菜，每周公布一次伙食账目，官兵吃一样的饭菜，领一样的“伙食尾子”。同志之间互相照顾帮助，改造旧军队的旧习气，树立新型军队的民主新风尚。大家都感到“教导队就像革命的大家庭一样”，虽然物资匮乏，但心里感到温暖。

毛泽东、朱德亲自授课

毛泽东、朱德十分关心教导队工作，经常来查看，询问学员的学习生活情况，有时抽空讲上一课。毛泽东教育大家：“打仗不能光凭勇敢，要想点办法，张飞还要加上诸葛亮。”

毛泽东讲课谈笑风生，扣人心弦，总能给人以启发和鼓舞，因此，教导队都把毛泽东讲课称作是“毛委员发饷”。当时，军需十分拮据，连每

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不能保证，根本无饷可发，而毛泽东讲课就像发饷一样受人欢迎。

比如，针对部分官兵“打向城市”的思想，毛泽东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毛泽东的讲话，澄清了一些同志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并战胜敌人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注重工作细节。学员写宣传标语，走到哪里随手就写。毛泽东看见后说，标语要写得高一点，既显眼又不容易被破坏。一次，他看到教导队写“打倒帝国主义！”中的“倒”字少了一笔竖画，便笑道：“不打都会倒，少了一条腿嘛！”特意督促纠正。此后，学员们每写一条标语，都会认真检查。

朱德常常鼓励学员战胜困难：“多想想办法，路是走出来的，天下是打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井冈山冬季冰天雪地，有几次朱德早起看学员

上操，看到大家跑步回来，一个个脸上红通通，头上热气腾腾，很高兴地说：“你们有办法，这不冷了呀！”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教导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学中紧密联系当时的斗争形势，讲授在军阀混战“夹缝”中生存发展的战术。同时，批判地吸取和运用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的训练方法，继承广州、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经验。为应对四面临敌的复杂环境，教导队专门培养学员掌握化装打进敌军内部侦察的本领。

教导队经常组织实兵演练。1928年11月，根据红四军军部指示，教导队按照苏联红军的连以下编制进行编队演练。演练结果表明，这种编制方式并不适合中国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于是又恢复到国民革命军的编制方式。

在实战中，教导队跟随部队到酃县打土豪，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组织工会、农会。教导队负责扼守通往酃县的八面山峭口，修筑峭口工事，挖壕沟、运树木、削竹钉。有一次，敌军进犯八面山峭口，教导队枪少，每支枪只有两三发子弹。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教导队没有硬拼，而是在悬崖上放一些木头，木头上堆了很多石头。当敌人疯狂地冲上来时，大队长一声令下，飞石滚木，轰隆隆劈头盖脸向敌人打去，就像山崩地裂一样，敌人一个个滚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没有死的敌人吓得肝胆俱裂，抱头鼠窜。教导队未发一枪，打得敌人落花流水。

1928年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根据前委决定，在教导队基础上创办了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1929年1月，为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出师赣南。大部分学员毕业回到部队，其余人员随军南征。这些掌握了一定军事技术和政治知识的学员，很快成长为基层的中坚力量。3月中旬，红四军随营学校成立，红军的院校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红色记忆

宋代荔枝进入寻常百姓家

□ 陈 渊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笔下这传诵千年的诗句，道尽了古代运输荔枝的艰辛。荔枝又叫离枝，这种“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娇贵水果，自古便是珍馐，唐代之前运输尤难。但是到了宋代，情况有了不同。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新荔枝四绝》中写道：“越泊飞来不作难，红尘一骑笑长安。”荔枝成为文人墨客乃至部分市民亦可品尝到的水果，这一转变背后，宋代社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荔枝自由”。

运输便捷让荔枝“飞入”寻常百姓家。宋代，福建路（今福建省大部）逐渐崛起为新兴的荔枝主产区。史料记载，福州、莆田、泉州、漳州等地在宋代已广泛种植荔枝，产量颇丰。相较于唐代的都城长安，无论是北宋都城开封，还是南宋都城杭州，都距离福建较近，因此运输也更为便捷。福建荔枝在北宋时的主要运输路径是：通过海船运至杭州，经大运河运至扬州，而后利用汴河等内河水道转运至都城开封。南宋时则只需海运至杭州，范成大描述说：“四明海舟自福唐来，顺风三数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减，大胜、涇阴所产。”生动证明了水路联运的高效运输对保持荔枝新鲜度的重要作用。

宋代荔枝的种植技术已有长足发展。宋徽宗《宣和殿移荔枝》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



中看”。宋徽宗在开封成功移植荔枝并结果，尽管详情有待考证，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荔枝栽培技术水平的提升。民间对荔枝品种的选育和栽培经验也日益丰富。北宋名臣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福建地区的荔枝品种，如“陈紫”“火山”“丁香荔枝”等，并述及其来源和特性。福州西禅寺内至今仍存一株相传种植于北宋天圣年间的“宋荔”，树龄逾千年，但仍能结果，这亦是宋代荔枝种植历史悠久的生动见证。栽培技术的进步使荔枝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保障，为荔枝大规模供应提供了可能。

荔枝保鲜自古是难题。宋人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发展出多种保鲜和加工方法，有效延长了荔枝的“货架期”。筠籥，即竹筒密封，唐代已有此法，宋代继续沿用并有所发展。蔡襄《荔枝谱》中还提及，运输时在竹筐或

容器内铺上厚厚的荔枝叶，利用荔枝叶本身的特性保持湿度、延缓腐败。宋人郑樵在其著作中提到过用蜡封存荔枝枝条以保鲜的方法，称“蜡封其枝”法。

除了鲜荔枝的保存，《荔枝谱》中记载了“蜜煎”荔枝的制法：将荔枝去壳后用蜂蜜腌渍、熬煮，制成甜品，不仅风味独特，且能长期保存。“红盐”制法是宋代重要的荔枝加工技术，此法将荔枝用盐水处理后再晒干，制成荔枝干，色泽红润，易于保存和远途运输。宋末元初人周密《武林旧事》卷九载“高宗幸张府节次略”的宴席干果中便列有“荔枝”，很可能就是此类荔枝干。

商业发展铺就荔枝入市的通途。宋代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旺盛。在《武林旧事》等笔记中，可以窥见荔枝

进入城市市场的蛛丝马迹。例如，《武林旧事》卷六“果子”条目下，列有“荔枝膏”等加工品，这表明以荔枝为原料的食品已在市面出售。福建地区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即在荔枝开花时便与果农签订合同，预购整片荔枝林的产出，这种商业契约无疑是以远销为目的。因此可以推断，通过活跃的商业活动，品质上乘的鲜荔枝和更易保存的荔枝加工品，已开始供应城市市场，部分富裕市民阶层也有机会品尝到这种昔日的“岭南奇珍”。

据《淳熙三山志》等文献记载，在宋代，福建等地每年仍需向朝廷进贡大量的荔枝，宋徽宗等皇帝亦有将荔枝作为珍品赏赐近臣的记录。然而，与唐代几乎完全依赖国家驿道系统满足皇家需求的模式不同，宋代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由商人开辟的商道，形成了荔枝流通的另一条重要渠道。



□ 高 低

瓦当史韵

梅雨季的雨丝斜斜织着，我站在老宅院下，看青瓦上的水珠儿顺着瓦当的弧度滚成串流淌下来，晶莹剔透、水花四溅。那感觉就像谁把银河捻碎了，往人间撒了把碎钻。忽然就想起《辞海》里那句“当，底也”。这枚守在檐角的陶片，原是替瓦片“兜底”的守护者，却悄悄活成了屋檐上的千年史书。

西周的素面瓦当最是素净。那时的人大概还怀着对泥土最本真的虔诚，只将陶土捏成圆饼，在窑火里焐出温润的包浆。它们静默地伏在屋顶上，看官室里的钟鼎彝器在岁月里褪色，看《诗经》里的“如翟斯飞”般壮美的官室建筑被风雨磨蚀成模糊的记忆。直到秦人带着虎狼之师的雄风叩关而来，瓦当才突然醒了——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出土的动物纹瓦当上，鹿儿扬着脖颈，豹子绷紧肌肉，猛虎叼着燕子，连羽毛的纹路都带着风。那些被游猎生活淬炼出的野性，在陶土里活成了跃动的雕塑。

汉代的瓦当最是“会玩”。文字瓦当像极了汉代人的朋友圈，“长乐未央”是宅家的日常祈愿，“汉并天下”是汉朝直截了当的炫耀，“维天降灵”又带点玄乎的哲学味儿。最妙的是四神瓦当：青龙盘曲如云，龙鳞在光线下泛着青铜的冷光；白虎张牙舞爪，虎尾卷起的弧度刚好接住檐角的风；朱雀展翅欲飞，尾羽的纹路细得能数清羽毛；玄武龟蛇交缠，龟甲上的纹路竟藏着二十八星宿的“密码”。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里那枚“天人合一”瓦当，金乌神鸟衔着太阳，玉兔蟾蜍捣着月亮，连边角的连珠纹都闪着星子般的微光——原来古人的浪漫，是把宇宙装在一枚瓦当里。

宋元以后，瓦当慢慢“世俗”了。莲花纹取代了四神纹，大概是佛音绕梁，连瓦当都沾染了香火气息；到了明清，福祿寿喜的纹样挤走了莲花纹，仿佛有人将年画贴到了屋檐上。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是少了秦汉时的那股子“敢为天下先”的劲头。就像庄子说的“道在瓦甓”，真正的大道无处不在，不仅在高阁里，也在瓦当的泥胎里、纹路

和火候之中。

如今的不少老城区改造，总喜欢在新建的屋檐下复刻几枚汉瓦。国家大剧院的金属幕墙上，云纹瓦当若隐若现，像把古人的云霞裁了一角；文创店里，四神瓦当变成了书签，翻书时总觉得有风穿堂而过；数字艺术展上，动态的瓦当纹样流转，原来千年的光阴，不过是指尖滑过屏幕的一瞬。

站在博物馆玻璃柜前，看那枚“蕤年官当”，当年秦惠公的宫殿早已化作尘土，这枚瓦当却带着“蕤年官”3个字，把一段被史书遗漏的故事讲给今人听。忽然懂了一位博物馆馆长说的话：“传统是传递的火焰。”瓦当从西周的素朴，到秦汉的雄浑，到唐宋的雅致，再到今天的新生，从来不是守着旧壳叹气，而是把每个时代的温度，都焐进这方寸之间。

雨停了，檐角的瓦当还滴着水。我伸手接住一滴，凉丝丝的，像接住了三千年的光阴。原来对历史文明的感悟，从没有被局限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我们仰望见的那一瞬间。这是瓦当替岁月盖下的印章，是我们与古人共享的屋檐，是文明从过去走向未来最温柔的注脚。



肆，丹实全应胜木奴”。曾巩《荔枝四首》其四云，“金钗双捧玉纤纤，星宿光芒动宝奁。解笑诗人夸博物，祇知红颗味酸甜”，对闽越荔枝的味道进行了科普。荔枝成为文人笔下的常见题材，也常作为雅致的馈赠品在士大夫之间流转。借助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荔枝的形象深深植入社会文化记忆，激发了各阶层对荔枝的向往和潜在的消费欲望。

尽管宋代荔枝的获取相较前朝更为容易，但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新鲜荔枝依然是较为昂贵的时令水果。然而，民间总能找到满足需求的方式。在《武林旧事》卷六“凉水”条目中，还记载了一种名为“荔枝膏水”的市井小食。这种“荔枝膏水”并非由真正的荔枝制成，而是多用乌梅、杨梅等价格更为亲民的水果，通过特殊加工方法仿制的荔枝味饮品。这种替代品的出现，生动反映了在新鲜荔枝消费门槛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市民对荔枝风味的向往，以及商家为满足这种市场需求所做的努力，当然，它的出现也极大丰富了宋代市井的饮食文化。

